论“童年研究”的视角转向

林　兰

摘要　通过对近年来兴起的“童年研究”热进行梳理，对比两种“童年研究”范式，呈现了“童年研究”的视角转向。传统“童年研究”受到发展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社会化”理论的主控，使得儿童的主体地位被遮蔽；而新“童年研究”以“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为代表，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的形式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童年研究”视角转向的背后反映出研究者对儿童认识的不断加深、社会发展对儿童人权的尊重、以及对儿童研究伦理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　童年研究；发展；社会化；新童年社会学；视角

作者简介　林　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7）

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 18 世纪对“儿童”及“童年期”的发现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在欧美等国掀起的“儿童研究运动”，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对儿童观念变迁进行的历史考察。近两个世纪以来，对儿童及童年的研究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童年研究”开始突破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在多个学科领域掀起研究热潮。

对多数研究者而言，“童年”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概念。当“童年”成为一个可供研究的对象时，由于受到不同年代、地域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对“童年”的解读视角、研究结论会存在很大差异。在对“童年”所进行的研究中，如果以时间为轴点，以研究视角为划分依据，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自 1930 年代，对孩子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取向的。”[1]这一研究取向是传统“童年研究”的代表。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法国社会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发表专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开启了新“童年研究”的序幕。阿里耶斯首先向传统的童年概念发出挑战，通过对儿童观念史的考察，他指出，童年并非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童年是由社会历史建构的。之后，“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更加丰富了童年的研究视角。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笔者将“童年研究”从时间轴上划分为传统“童年研究”和新“童年研究”。传统“童年研究”受到发展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社会化”理论的主控，而新“童年研究”则将“童年”放置在更加宽广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中。“新”相对于“传统”或“旧”是强调随着社会发展，研究者对“童年”认识的加深以及研究旨趣的转移。

一、传统“童年研究”的视角及其意义与局限性

传统“童年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其立论基础是发展与社会化的观点。儿童被视为需要照顾或管束的不成熟对象，而成人则是一种完整、成熟、理性且融入社会的个体。儿童被摆放在发展的进程中，评价儿童成长最直接的依据是发展心理学家所制定的儿童身心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指标。传统“童年研究”者受理性实证主义的影响，通过严格的实验室观察，“经手千百万个生动的儿童，最终描绘出一个抽象的儿童形象”。[2]在传统“童年研

究”的背后是一种以成人视角对儿童形象的简化，这一过程也固化了成人与儿童的阶层化关系。

（一）传统“童年研究”的基本视角——发展、社会化、需要

心理学最初的研究兴趣是通过研究儿童个体，找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学家则重视研究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心理学家以“年龄”为依据，研究儿童在认知、道德、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坚持儿童在一定时期内会经历相对固定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具有普遍性，基本每个正常儿童都会经历。“发展”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关键词，例如皮亚杰（J.Piaget）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弗洛伊德（S.Freud）的儿童情绪、情感发展阶段论以及科尔伯格（L.Kohlberg）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上述研究具有的共通特征就是，都以“年龄和阶段为基准，作为划分人类发展的进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发达和成熟，认知、人格和道德逐渐摆脱生物本能的控制，走向文明理性的主导。”[3]然而在这种论述中，明显地充满了生物学色彩，同时又具有演化论的观点。儿童和童年的研究被局限在生物学范畴内。儿童的不成熟性与待发展特征，使得童年期成为了一个不具重要意义的过渡阶段，重要的是通过成人的帮助，顺利进入成年期。成人要通过提供各种手段满足儿童在成长初期的发展需要，帮助儿童与社会建立起关联性，帮助儿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为顺利进入成人社会打好基础。这一过程中，儿童“需要”的满足、“社会化”的实现成为关键词。然而，这一理论背后却预设了童年阶段的暂时性以及成人生活的完美状态，童年成为成人生活的准备期。儿童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的（becoming）状态，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个体和未来的成人，只有成人才是一个完备的成熟存在体（being）。

由于发展心理学的结论往往是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也被冠上“科学”之名。这种科学性使得当时的教育学者将发展心理学视为认识和了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基本手段。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在欧美进行的儿童研究运动，就是大量运用生物学及心理学理论进行的儿童及童年研究，这次运动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也为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和现代学校教育理论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学依据。正是基于对发展心理学研究结论的重视，现代学校被视为儿童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学校要对儿童进行身心的照顾和规训，父母以及学校师长被视为儿童的重要他人。

（二）传统“童年研究”的支配框架——二分法与成人视角

尽管传统“童年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早期进程，然而这一进程的背后又隐藏着教育异化的危机。“新童年社会学”家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与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指出，传统“童年研究”受“二分法”的逻辑所控，对童年和儿童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支配框架”[4]基础上的。

儿童	→	成人
自然	→	文化
单纯	→	复杂
非道德	→	道德
非社会	→	社会
成长中的个人	→	具有个人特质
生成		存在

支配框架（Prout&James，1997）